

从破土到扎根:抗战时期山东农村中共基层组织的生长

张业赏

(山东师范大学 抗日战争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014; 齐鲁医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300)

摘要:抗战时期是中共基层组织支部在山东广大农村生长、发展与成熟的重要阶段,是赢得群众、夯实执政根基的关键时期。在中央决定1939年党员和基层组织一般停止发展、以整顿巩固为主之时,山东党组织结合支部和党员发展相对缓慢滞后的实际,创造性提出发展与巩固并重的方针,采取实行普遍、平衡、全面、深入、正规化发展的方式方法,实现了基层组织支部和党员规模的迅猛发展,并探索出群众运动、组织整顿、党员教育三位一体推进支部建设的做法经验。抗战时期山东以密切党与群众联系为中心,全党参与、责任下沉、典型试点、专门整顿与支部常态化建设相结合,确立党支部在农村的核心领导地位等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探索,使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抗战时期山东党支部整顿形成的树立支部党员权威,组织建设、群众运动与党员教育密切结合等基本经验,为加强新时代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关键词:抗日战争;山东省 抗日根据地;党支部;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6)03-0019-13

收稿日期: 2026-02-0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1CDSJ06);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战略形成及实施研究。

作者简介: 张业赏(1965-),男,江苏丰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研究员,齐鲁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3.015

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在中共组织系统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各级组织决议决定,管理、教育、监督党员,联系和团结群众,保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神神经末梢。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挥政党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保证。综观党史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史的研究,在各级各类组织史的编纂与规章制度规定的汇编,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及研究视角的更新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各级各类基层组织,特别是党支部的组织状况、实际运作和效能发挥的研究成果颇丰。有的学者从基层视角和实践视角对抗战时期农村党支部的运行状态和效能进行了探讨。^①总的看来,以往研究多着重于基层组织的发展、组织形态的静态描述等方面,把农村基层组织发展演变和政治功能、组织效能发挥放在抗战全局和党的整体建设中审视和研究还不够。本文拟以抗战时期山东农村支部的产生、发展、成熟为主线,考察山东各级党组织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上级关于发展巩固组织的指示,与抗战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相结合,逐步完善支部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造,实现对社会的管控和治理,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使山东成为中共牢不可破的基地的历史过程,并对期间形成的一套较为成熟的支部建设做法和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以期为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①参见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共农村党支部研究——以山东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秉奎:《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李里峰:《中共组织纪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实施》,《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杨豪:《民众何以入党:华北根据地农村基层党员入党动机研究(1937—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年;王芳:《新世纪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2期。

一、“一面巩固、一面扩大，扩大的一个，必须是巩固的一个”

抗战时期，山东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党政军群组织团体中设置的机关支部和在广大农村设置的农村支部。农村支部是基层组织的主要形态，以一个村为基本单位的农村支部绝大部分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建立的。抗战之初，与华北其他地区相比，山东党员规模和基层组织支部数量发展缓慢，相对滞后。1938年3月，为使党的发展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改变“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的状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①。在华北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迅速进入山西、河北等地，帮助地方党组织大规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晋察冀、晋绥等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党的发展一般地应当停止，而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②

抗战时期，山东党的组织体系大致分为六个层级：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委（县工委）—分区委—支部（或特别小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1936年恢复重建的山东省委把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机构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至1938年初从省级到县级党的组织机构等在全省各地基本建立健全。中共中央根据山东即将沦为敌后的形势，要求山东省委扩大党员规模，把党的组织和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动员到游击队内去工作，另一部分在地方在秘密条件下坚持党与群众的工作。山东党组织积极号召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到1938年12月若干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2.45万人的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山东纵队，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山东各级党组织把骨干力量和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动军事斗争，建立抗日武装上，在地方上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组织支部的工作实际上无力顾及。全面抗战爆发时山东省委能够联系领导的党员有20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8月中央要求一般停止发展以整顿巩固为主时，山东党员仅有51500人，基层组织支部的发展在绝大多数地区处于停滞状态，远远不能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山东地方党的建立和发展比较迟缓，加之关门主义倾向及地方党的作风部分存在，特别是组织工作的薄弱，一年来仅仅打下党的初步基础，党员数量还很薄弱，发展党员还是重要工作。”^③

早在1939年初中央就敏锐觉察到山东党员数量少、基层组织发展慢的问题，指示“在山东，除努力巩固和发展山东纵队外，应努力发展地方党。据我们已得材料，山东党员数量仍少。”^④“在胶东及整个山东，应大量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我军活动的地区。”^⑤中共中央针对山东党员和基层组织发展落后的状况，在1939年下半年确立全党的发展以整顿和巩固为中心任务的同时，同意山东采取发展和巩固并重的工作方针，“在整理巩固现有党员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发展新党员”^⑥。1939年12月，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

①《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②《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39—1940），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③《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1939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④《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⑤《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1939年5月13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⑥《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1939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8-99页。

作方针的指示再次强调“山东及苏鲁战区的党还应扩大。”^①1940年6月,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斗争生活》第一期发表《山东党的建设问题》,全面分析阐述山东党组织发展状况,正式提出发展与巩固并重,“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因为山东党在发展上比去年间一时的晋察冀一个边区还落后,同时还有很多地区无党的工作,山东党还在‘开荒’,扩大党,还是一个新任务。我们应该适当的扩大,一个一个吸收,扩大的一个,必须是巩固的一个。”^②

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发展壮大和一一五师主力入鲁抗战,为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③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底,山东农村支部迅速发展并在抗日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中共北方局指示山东党组织“目前党的建设中心工作在于支部,应该加强各级党部对于支部工作的注意。”^④在1939年夏季鲁中区反“扫荡”之后,山东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逐渐认识到扩大党员规模,建立基层组织支部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县级以上组织定期规定发展新党员的总数目,各级层层下达党员发展具体数字,要求定时完成。罗荣桓专门派一一五师政工人员帮助指导地方党发展党员和基层党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在党员,只有数量足够多的党员才能支撑支部数量的增长和覆盖面的扩大。山东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利用传统的血缘、地缘、学缘等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和各种方式发展党员,想方设法说服动员社会各阶层有抗日意向的民众入党。一些抗战之前的党员将家庭成员和同一宗族、村庄的农民发展为党员。有的地方利用民众对政党、群众团体、社会组织、抗日武装等的区别模糊不清的实际,以农救会、培训班名义集体集中发展党员,甚至以会道门的名义发展党员。当时党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党的领导机构多以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开展活动,许多地方将动员参加八路军、群众团体和动员加入党组织作为一体工作开展,“有的党员在发展党时用扩军方式,先说八路军怎么好,不能参加八路军打仗,可参加暗八路。其次是以发展农救会的方式发展党,用介绍农救会员名义发展党。因此,有一地区的农救会员都说自己是党员,是毛泽东领导的,其他群众团体是八路军领导的。”^⑤经过一年半的快速发展,基本改变了山东各地党员和基层组织发展状况。如清河区,1939年6月以前,全区有党员900人,到1940年2月,就发展到12000人,10月又发展到16000人。^⑥1940年4月山东全省党员人数达11万人,“到1940年底,我们在全山东的武装发展到13万人,地方党员153000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县政府有122个,我管理及半管理的人口约1200万人。”^⑦山东抗日根据地成为面积达6.3万平方公里,党、政、军、民等组织和团体同步发展的名副其实的根据地,以自然村为基本单位的农村支部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⑧如鲁中区有些县80%以上的村庄有了党的组织。^⑨

①《中共中央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页。

②朱瑞:《山东党的建设问题》,1940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3页。

③《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

④《北方局给鲁西区党委的指示信》,1940年7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1页。

⑤《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巩固党的总结》,1942年1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⑥《分局、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之《景晓村同志汇报清河区的工作》,1943年9月29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0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

⑦《刘少奇关于摘录山东工作报告问题致毛泽东电》,1944年4月25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⑧1940年11月朱瑞在向中共北方局、中央军委等汇报山东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工作的报告中,谈到党的组织发展时,在谈了党员人数之后说“(2)一年来发展一万以上”,从上下文语义判断,应当是指支部数量。

⑨高克亭:《我的革命生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0页。

至1940年底,山东党员发展和基层组织支部建立的任务目标基本完成,但发展与巩固并重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实现。“由于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这一点,在大量发展、发展几倍的号召下,不加挑选,以追求完成数目字为光荣的成绩,造成了许多毫无生气的支部。”^①如滨海区“以当时日照来说,1939年一年当中党员有十倍增加,但是总起来说当时是拉夫主义,不知党为何物,以完成上级任务为唯一目标”。^②党员发展中单纯追求数目字等做法,致使基层组织支部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支部的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第一,有的地区支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全面不普遍不平衡现象。有的地方党员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党员所在的地域和村庄并没有随之增加,甚至有的村党员占人口1/2以上,以至没有了可发展对象。如泰山区、沂蒙区出现“绝户支部”“绝户小组”“绝户党员”,可是周围村庄甚至连一名党员也没有。有的地方的村有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党员,而邻近村庄一个没有。“如牟海三区发展党存在着三挖的奇怪现象。一挖挖一村,专在这一村发展。二挖挖一姓,专在这一姓里面发展。三挖挖一家,将其全家都发展为党员。”^③有些地方党员短时期内党员数量剧增,但支部的数量和覆盖面并没有随之增加,“党员分布的地区还不到全省的一半,即在我基本的地区很多的村庄没有党的组织,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④第二,支部组织生活不规范。有些地方党的支部和党员缺乏对党组织性质、功能、政策的一般认识,将党组织与八路军、农教会等群众团体、传统农村社团、宗教会门组织混为一谈,对过党的组织生活的意义和组织程序规定多是一知半解。如泰山区“有的支部把小组划成精干组、普通组、同情组、落后组,党的组织的基本原则都不知道,走亲戚也带关系,中央巩固党的决定,也未引起注意,支部开会不经常,开除或恢复党籍都很随便,慎重对待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问题是比较少的。”^⑤胶东区东海地委各县区农村支部中经常过组织生活者不过半数,且开会“多半是玩会,吃几袋烟,说说笑笑,拉拉扯扯也就过去了。”^⑥沂蒙区部分县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党员不过组织生活,有的支部与上级失去关系而两年未开过小组会。农作繁忙、经商出门、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时,党员大多不能参加会议。^⑦第三,对发展党员的规定和程序随意变通现象时有发生。党员发展对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和现实政治表现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以工人、农民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为主,其他人员“除非有显著功绩的个别分子经区党委以上党机关批准外,一般的禁止征收入党”^⑧,同时规定对党员干部的成份定期审查。但许多地方为了完成发展党员任务和履行征兵、征收田赋、给养等功能,基本不执行这些规定,“结果吸收了一些没有阶级觉悟,不合组织原则的党员,建立了一些无生气的支部,以致抱着‘为了抗日’‘听说八路军好’‘不扩军、不打狗’‘办公事快,自己少拿给养’,‘能知道消息’等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加入了党,使党的成份异常不纯洁,使支部成了一个非战斗的集团。”^⑨

“健全支部,健全每一个共产党员,更是一切工作的目的与基础,没有健全的共产党人及党的基本组织一支部,党的一切工作会筑在沙滩上,是不巩固的。”^⑩此一时山东农村党支部除在组织生活和发展党员等组织建设方面存在问题外,对基层组织党支部在抗战全局中的作用和政治功能、组织功能,许多党的

①黎玉:《论山东农村支部工作的病态与整理支部的方针》,1942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斗争》第22期,第18页。

②滨海地委:《五年来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4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9-01-0003-002。

③第三区党委(胶东)组织部:《1941年组织工作总结》,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187-001。

④《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巩固党的总结》,1942年1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⑤黎玉:《从泰山区支部的病态谈到今后的整理支部工作》,1942年,山东省档案馆藏 G001-01-0065-007。

⑥《胶东区东海地委组织部九个月来组织工作总结》,1942年6月,山东档案馆藏 G024-01-0200-002。

⑦《鲁中区党委五年组织工作总结》,1943年3月,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7-01-0020-001。

⑧《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1939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9页。

⑨黎玉:《从泰山区支部的病态谈到今后的整理支部工作》,1942年,山东省档案馆藏 G001-01-0065-007。

⑩朱瑞:《山东党的建设问题》,1940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

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支部干部更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党员认为照常开会、照常发展党员就是合格健全的支部。合格支部的标准应当是“健全的生活加上教育党员、领导群众、动员战争”，^①1939年10月，山东分局提出合格党支部建设的五项标准，即党员过党的经常生活；实行党员的教育制度；正确的领导群众团体；保证支部任务的完成；建立支部的领导制度等。^②由于山东主要任务是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农村支部的建设工作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开始，“一般还只满足于党工作表面的发展，还没有十分注意把整理及健全支部成为党的建设之基本工作。”^③在敌占区建立支部，农村支部与一般党员的思想教育等基本没有开展。

总的说来，抗战初期山东农村党支部建设工作虽存在一些问题，但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山东采取发展与巩固并重的工作方针，及时改变抗战伊始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缓慢的不利局面，迅速扩大党员规模，加快支部建立步伐，由战前仅有的个别支部秘密活动发展到实际处于公开半公开状态的众多农村支部在齐鲁大地破土而出并迅速发展。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部队就“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④山东农村基层组织支部的发展，健全了党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扩大了中共组织在民众中的影响，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巩固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三年来山东共产党的发展，是奠定了山东抗战的基础，成为群众拱卫的核心”，“山东的共产党已经是山东唯一的有广大群众性的党，是山东群众最拥护的党。”^⑤

二、普遍、平衡、全面、深入、正规化发展

1941年至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为将中国变成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华北开展多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山东抗日根据地遭分割、封锁，面积缩小、人口下降，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等主力部队被迫转入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共山东分局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确定以普遍、平衡、全面、深入、正规化发展为今后之中心工作，提出了“面向支部”的口号，并强调“建立及健全县委以下尤其是乡村支部工作为中心”，^⑥对农村支部进行初步整顿。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严酷对敌斗争中坚持“熬时间、储力量”，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不但在根据地基本区生存下来，在敌占区、边缘区、游击区等也没有垮塌并得以发展巩固，为渡过严重困难时期，争取形势好转，转入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山东各级党组织将农村党支部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1941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指示与决定》对党的领导、党的发展与巩固进行了总结和部署。针对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指示与决定》对农村党支部的合格标准、设置原则、健全组织制度、规范组织生活、发挥支部作用等作出明确规定，力求实现支部组织生活和党员发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一，规范党员发展程序，严格入党标准，调剂党员和支部成分。停止利用培训班、农救会等集体入党方式，改变过去只靠党员干部发展党员的缺点，强调所有党员都有发展党员的义务和任务。在基本地区一般不准采取个别突击方式发展党员，要在群众团体中找积极分子作为发展的对象，在进行群众教育中注意一般政治教育与

^①朱瑞：《山东党的建设问题》，1940年6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9页。

^②《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1939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页。

^③朱瑞：《山东工作报告》，1940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4页。

^④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31页。

^⑤黎玉：《中国共产党与山东抗战》，《大众日报》，1940年7月1日。

^⑥朱瑞：《山东工作报告》，1940年11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个别谈话，完成入党前补充教育后，才准吸收入党。第二，健全规范组织生活和组织制度。将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制度，规范组织生活作为工作重点，逐步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汇报、检查、总结、会议、调查统计等工作制度，定期不定期调查统计党员数目、成分等，规范恢复、转移党的关系具体规定，开展对党员入党动机的调查研究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党员教育制度，规范党员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第三，调整优化党员审查制度，规范党员惩处奖励标准和程序。过去县委以下特别是农村支部干部对组织原则及干部政策掌握较差，为审查而审查，甚至把审查工作看作单纯的清洗党员，“如支部委员不了解党内处分，认为党内处分也要罚款，打腕板子，这是很可笑的。”^①在北方局指导下，山东改变定期审查的做法，在经常工作中了解干部，克服消极片面找毛病的倾向，改变一些不恰当的审查方式，把审查党员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而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改变有些把审查党员单纯看作清洗党员工作的做法，慎重处置开除党籍等。实行两级批准制，“凡清洗党员必经上两级党委谈话后决定，以免形成随便清理现象。”如胶东区东海地委经过1941年的整顿，“党的工作走向新阶段时期，建立了各种制度，严格了各种手续，如会议制度、入党手续、转接关系，尤其是作了普遍审查工作，使党开始踏上巩固的境地。”^②

为实现农村支部普遍、平衡、全面、深入发展的目标，在支部整顿建设过程中，对支部设置的原则、评价工作的标准及一些具体问题，山东分局及各级党组织及时沟通交流、讨论研究，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一些重大问题和原则性问题也及时予以指导，确保支部整顿和建设的正确方向。关于农村支部设置的基本单位和支部领导机构，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实际予以调整，以便更好发挥支部在村庄中的领导作用。抗战初期，山东农村支部基本上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起来的。1941年10月，山东对支部在村庄设置原则进行调整，规定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农村支部，特别是鲁中、鲁南山区村庄，以人口多少、距离远近、村数多少为原则划分行政村建立支部。党员过多的行政村经分区委、县委同意可设中心支部，或增加支部委员2至4人，每一个支委分配领导若干小组。^③不久，行政村领导单独形成一级，妨碍分区委对支部工作领导及支部效能发挥的问题开始显现。实施两个月后又改为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支部，同时将工作基础好的支部划为中心支部，经分区委指定领导附近几个自然村的支部工作，但不妨碍分区委对各自然村的领导。支委会根据党员数量及工作需要确定人数，在根据地的支部中一般设立支部书记、组织、宣传、政府、武装5个委员，取消民运委员，将群众工作真正变成党员的日常工作。保持支委的相对稳定，不准轻易调动，支部书记专职不得公开兼任村长、群众团体负责人等。

关于党员发展数量，山东分局组织部起初具体要求：党员发展数量最多不得超过全村人口的5%。北方局指出，发展党员是依靠当地群众的觉悟程度及发展对象是否具有入党条件而决定的，不能单纯按村庄人口多少、成分好坏决定党员发展数量，党员与人口的百分比只能作为一种测量和评价党发展状况的尺度，不能作为发展党员的标准。关于发展党员的成分问题，山东为了改变党员中贫雇农占少数的现状，保持工农成分的比重，规定雇农、产业工人应占全体党员的20%~30%，贫农及贫苦的手工业者、佃农，占50%~60%，中农与富裕的手工业者、革命知识分子，不得超过20%，妇女要达到20%。北方局对山东重视成分问题予以肯定，也明确指出机械规定各种成分所占具体比例“这也不很妥当”，“规定各种阶级成分的一定比例，作为发展党的标准，也是不妥当的”，并分析这种做法的影响和危害。^④

经过初步的整顿建设，农村党支部的地区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像沂蒙有些地方已经做到每村都有党

①《乐陵二区后屯村支部工作总结》，1944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6-01-0091-003。

②中共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第一地委组织部：《1941年八个月来党的组织工作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200-001。

③《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传达贯彻〈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指示与决定〉的通知》，1941年10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31页。

④《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对山东分局组织部巩固党的总结报告的指示》，1942年3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0页。

的组织，哪怕是穷乡僻壤的小山沟或半山腰的小村落。”^①不在落后区、空白村发展党员的现象有所改变，游击区、敌占区发展党员和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也有了较大进展。突击发展、集体入党等拉夫发展现象明显减少，简单依靠干部发展党员，党员不发展或不会发展党员，上动下不动现象基本杜绝。支部组织生活基本规范，大部分党员能过组织生活，能开会讨论问题和上级指示，有的小组还能开展思想斗争。据统计胶东区“计第一地委能过组织生活的党员占70%，第二地委占65~70%，第三地委占58%~65%，第四地委占60~70%。”^②

整个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山东农村支部组织正规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区域覆盖上基本实现普遍、平衡发展，但整顿工作开展不平衡，许多地方“仍然多从静止的单纯从组织成份、会议形式、党内生活去改造支部”，^③许多支部未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第一，“面向支部”，以健全县委以下乡村支部为中心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并未真正普遍实现。胶东区党委后来总结到：“几年前区委即指示‘一切工作在于村’、‘要面向支部’等口号，但我们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书面上，长期不了解支部工作，不做支部工作，本来都知道胶东支部问题最多最复杂（如成分的不纯洁、支部严重的病态等）但未能根据具体情形加以整理，更没有从某些支部的发展史上去分析，得出一定的规律，更没有积累出改造支部的一套经验。”^④鲁中区党委也认为：“确实的支部工作是我们全部党的工作最薄弱的一环。上级党非常中肯有力的决定，到了支部就变得无声无息。不管你作出多么伟大的指示，到了支部就变成简单的发展党，或扩军或保证开小组会，甚至上面叫喊得声嘶力竭，下面还根本不知道。”^⑤第二，各级上级组织对支部工作了解不深入，指导不具体不细致，存在一定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分区委以上党组织上、下级之间往返巡视、传达报告、书面报告和文件指示较多。由于一个分区委领导数十个支部，且农村支部成员和党员大多数为文盲，素质低下，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渠道并不畅通，结果导致县委、分区委和支部之间，书面报告、汇报很少，分区委与支部间的关系大多比较疏远。许多县委、分区委干部长期不到支部去，“即到了支部以后，也是照例开会，照例传达计划，分配数目字，按期回来要成绩，支部完不成任务则加以斥责，以致形成脱离实际的领导，在支部中丧失威信。支部脱离上级，害怕分委，有些竟闭而不见，或应付搪塞。”^⑥有的县委、分区委干部虽到了支部，但对支部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只做些扩军、征粮等临时工作，形成“走村逛支部”的现象。^⑦有的分区委“工作上命令多于动员，计划多于实际工作”，“所谓深入支部工作，就是有事无事，一月两趟（第一次是布置，第二次是总结）债主要账方式，能应付一套者就称为模范支部，要直接说没有做，便要斥责一顿，以致支部便杜撰一套来应付。”^⑧

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支部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组织建设的内涵理解有偏差，对党员的教育重视不够，具体工作与群众运动、抗日的实际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工作未能实现有机融合，是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改造支部。结果在日伪军反复“扫荡”“蚕食”“清剿”，特别是实行自首政策的情况下，各个战略区都不同程度出现党员减员和支部坍塌现象，更谈不上成为党的战斗堡垒和团结

①《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巩固党的总结》，1942年1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②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组织部：《第三区党委1939.10—1941.8二年巩固党工作总结报告》，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187-001。

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指示之决定》，1943年8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④《（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关于部内工作的初步反省》，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4-01-0187-003。

⑤鲁中区委二地委组织部：《反扫荡沂蒙区党的支部整理工作总结》，1942年4月29日，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7-01-024-001。

⑥《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1页。

⑦沂蒙地委组织部：《反扫荡中沂蒙区党的支部整理工作报告》，1942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7-01-0024-001。

⑧《清河区委组织部关于整支工作的讨论传达布置进行情况》，1943年3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 G001-01-0086-004。

群众的核心，“尤其在对敌斗争中经不起频繁的扫荡和持久的清剿，以致有些支部束手无策，有些支部被敌人政治攻势自首政策攻垮，个别支部甚至被奸细打入愚弄，发生投敌与叛变。”^①

在山东抗战最为艰难的1942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从华中北上指导工作，解决山东问题，是扭转山东抗战局面的转折点，也是山东农村支部建设由重视普遍、平衡、正规化进一步向全面、深入发展的转折点。有的学者认为，山东遭受的挫折比华北其他边区都更严重的原因，“实际上，这主要不是因为对手的军事力量强大，而是山东地区在经济上政治上重建乡村的工作很不充分和群众动员薄弱所带来的结果。”^②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刘少奇敏锐地发现群众运动未能真正开展是山东工作最薄弱的环节，党的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与群众运动、实际斗争结合不够是党支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关键。1942年5月，山东分局决定在山东各地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众运动。农村支部建设与减租减息、增资等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紧密结合，在群众运动中寻找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和改造支部，把动员群众，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作为增强支部凝聚力、战斗力的契入点。自山东分局到县委选择一个或几个村为中心，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领导力量和工作重点下沉开展试点，探索在减租减息、改善民生等群众运动中，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新建或改造支部，改善支部成员和党员成份，增加贫雇农在党员中的比例，在实际斗争中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提升农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朱瑞和黎玉深入山东分局在滨海区的“双减”试点县莒南、临沭的村庄蹲点调研，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全局，取得良好效果。

在抗日根据地结合群众运动加强支部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阶级观念、组织纪律、党的政策和秘密工作意识教育。在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山东地方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有所减少，其主要原因即是对党员教育不经常，一些党员缺乏坚定信仰和组织纪律，一旦遭受挫折就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如清河区党员1940年底至1942年8月共减员12850人，牺牲病故者仅353人，而失掉联系者达6832人，占减员的一半以上。^③在根据地大发展时期，虽然有党组织秘密活动，党员以乡村政权、群众团体名义开展活动的规定，但执行得并不严格，“某些党员和干部唯恐人家不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因而在言语上、行动上、服装上都特别标榜出八路化或党化的现象，甚至完全公开。”^④面对根据地缩小，游击区比根据地缩小得更快，各个根据地被分割封锁，甚至“南北一炮打透，东西一枪打穿”的严峻局面，在党员教育中加强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教育，转变支部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配备秘密干部，借助日伪“自首政策”将信念坚定、忠诚担当的党员渗透到伪组织和伪政权，单独编组或建立单线联系，顽强坚持斗争。如鲁南区在“群众工作坍去四分之三，政权亦大缩小”的时候，“党(组织)仍保持原状。”^⑤

组织整顿规范与加强党员教育、群众运动相结合，全面、深入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为山东度过严重困难时期，取得抗战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和有力支撑。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较1940年缩小1/3，村庄、人口、面积分别占全山东的15%、13%、14%，游击区占23%、22%、23%，敌占区占62%、65%、63%，^⑥一些县乡抗日民主政权名存实亡或合并联合，但农村基层组织支部并没有随之减少，而是在敌占区、游击区、边缘区顽强坚持下来，如“徂徕山区被敌伪化后，三分之二的村庄仍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党

①黎玉：《从泰山区支部的病态谈到今后的整理支部工作》，1942年，山东省档案馆藏G001-01-0065-007。

②[瑞典]达格芬·嘉图著：《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杨建立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③《五年来清河区党的建设党的发展工作(1938—1943)》，山东省档案馆藏G025-01-0005-003。

④《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目前组织工作的指示与决定》，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6页。

⑤《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第一、二区党委党员与群众发展现状的报告》，1941年4月11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

⑥山东省政府民政厅：《山东省历年面积、村庄、人口统计表》，1946年4月，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45页。

的秘密活动。”^①许多支部在敌人“扫荡”中被摧垮后迅即恢复，并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战斗力越来越强，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人民军队的靠山。如1942年春，沂水县宅科村党支部38名党员分工掩护照顾一次转移到该村的47名伤病员。^②鲁中区在日军1941年冬大“扫荡”中，“地方武装、游击小组、自卫团、群众团体甚至党政组织大多涣散，各自逃难，使根据地基础发生动摇，主力部队失去依靠。”^③而在1942年冬的反“扫荡”中，由于多数支部干部能领导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群众对我党与民主政府的拥护，对干部的亲热，对伤病员的爱护，都是上次扫荡所不能比拟的。”^④

三、密切党群关系，专门整顿与常态化建设相结合巩固支部

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赢得抗战胜利的根本，是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和组织体系健全完善有战斗力，与广大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党支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得力，但许多农村支部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从目前严重的斗争环境来检查我们的支部，我们可以随地发现我们许多支部是没有成为党的堡垒，没有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尤其已经不仅数次地发现了，我们的乡村支部在对敌斗争当中，还经不起频繁的扫荡和持久的清剿。”^⑤山东分局清醒认识到“山东党支部工作迄今仍是建设工作中最少成绩的一环。”^⑥“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组织仍然没有把握住群众运动，教育和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原则。”^⑦解决支部整顿与群众利益相脱离，在群众运动中建设党支部，成为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对敌斗争的当务之急。1943年之后，山东农村支部经过典型示范、全面推动的专门整顿向常态化建设转变的实践探索，加强组织领导，分阶段分步骤深入开展农村支部建设，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农村党支部和广大群众成为掩护和支持党与人民军队的“永远砍不倒的青纱帐”。

山东分局把整顿支部作为1943年度八项主要工作之一，把改善党群关系作为工作中心和检验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影响党群关系和支部效能发挥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许多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党与群众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对党的群众路线知之甚少，时常违背群众利益，甚至谋求私人利益和特权。一些拥有知识、财富、社会活动能力乃至宗族力量等诸多优势的社会阶层和乡村领袖加入党组织，成为村级政权和农村社会的实际管理者。支书村长被称为“村首长”，有的村支书“藉党营私，贪污浪费，欺压群众”，以“扩你的军”“开除”等感情拉拢、威胁利诱等方式打击反对者，致使党员情绪低落。胶东北海地区蓬莱七区三个支部书记都是富农，在平时还不错，但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却站在雇主方面斗争雇工。^⑧第二，许多支部干部和党员缺乏做群众工作，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能力。许多农村支部的负责人仅把支部看作是完成上级布置任务的组织，“有的认为支部是单纯保证行政任务完成的工具，只要能

①申春生：《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②李德：《抗战时期俺宅科村是怎样掩护革命同志的》，中共沂水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第3辑，内部资料，第173页。

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敌人对鲁中山区大“扫荡”的初步总结与指示》，1941年12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④《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印发〈接受鲁中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的通知》，1942年12月20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9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74页。

⑤黎玉：《论山东农村支部工作的病态与整理支部的方针》，1942年10月，中共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斗争》第22期，第15页。

⑥《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执行〈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指示之决定》，1943年8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页。

⑦[美]胡素珊著、启蒙编译所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的政治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233页。

⑧《胶东区第二地委：十、十一、十二三个月组织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月2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G024-01-0205-001。

田赋、公粮、慰劳、募捐、出差、站岗等工作做好就是好支部。”^①许多支部缺少独立活动能力，支部成员缺乏实际斗争锻炼，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由于缺乏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许多支部开展工作畏首畏尾，怕字当头。“在整个方面说目前在党内，下层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就是‘怕’，怕受训、怕调动、怕参军、怕提拔、怕做公开工作、怕脱离生产等。”^②不少支部党员只知动员群众募捐慰劳、挖沟破路、征粮派差，而帮助群众满足最低限度的切身要求则做得很少，形成严重的脱离群众，在群众中孤立甚至与群众对立的现象。第三，工作方式、工作作风上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有的党员认为老百姓是不能动员说服的，非强迫玩硬的即办不成事。”^③“三声老大爷不如一声小舅子。”“如许多党员在村里打垮了地主的优势，站在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命令群众，站在群众头上欺压群众，认为比群众高一头，而不知如何从解放群众当中去团结群众、提高群众。”^④“有些支部干事结论能说几十个新名词，可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武装斗争不关心，群众自发的武装斗争，有时因为我们官僚主义的干涉又消沉下去。”^⑤

为切实解决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亟须改变许多支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向群众负责，不能给农民以现实利益的状况，与民众结成事实上的利益联合体。山东分局决定“以党务工作的主要时间、干部及精力，在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工作中改造支部。”^⑥1943年1月15日和3月4日，山东分局连续作出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和补充指示，以半年为期，逐期改造支部；上半年以分局、区委、地委为主建立实验区，创造经验，指导各县；下半年以协助各县为主，普遍改造支部，年内将农村支部作一初步整顿。各级党委从山东分局起直接深入下层，深入支部，研究支部工作状况，了解其困难，研究各种不同情况下支部工作的方法方式，结合群众运动、对敌斗争改造支部。县委以上各级党领导机关定期分别到各个地区召集专门的党支部工作会议，总结与讨论支部建设，并总结经验以指导各地工作。各地抽调干部组成整支工作团深入村庄，直接面向农村支部，指导支部整顿和各项工作。黎玉亲自搜集整理支部的案例发给各地作为参考，具体指导整支工作。

上半年第一期支部整顿主要以选择试点、典型示范、重点突破的方法开展。山东分局、各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集中10余名干部，到分区委或支部担任其正式委员，长期工作；各县委也抽调3名左右干部，选择一个中心村支部作为实验支部，以同样的方式开展工作。山东分局适应农村环境特点和敌后特点，加强调查研究，注意研究农村习惯、生活形式及方式，并在滨海区直接负责整理一个分区及6个支部。鲁中区委及其所属地委抽调60余名干部负责整支工作。清河区委1943年2月召开为期五天的清中地区组织扩大会议，总结支部工作存在的问题，讨论具体问题，制定半年的整支计划，并对整支工作的创造性做法予以归纳提炼。^⑦

1943年8月，整顿支部由典型实验、中心突破开始转入普遍开展阶段。支部建设和整顿的责任主体由山东分局、区党委、地委转变为县委和分区委，县委以上领导机构主要负责领导责任。关于普遍整支工作，要求各区党委、地委通过召开整支工作会议、举办整支工作训练班等方式，使县区干部掌握整支指示的精神实质，学会初步的工作方法，重视工作经验的总结与传播。在普遍整支阶段，各地组织的整支工作团（组）继续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支部作为实验支部，组织部长亲自参加；对每一专门问题着重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如关于成份问题，解决村干部生产和工作的矛盾；总结工作尽量与县区委合一，及时将经验向党刊写通讯

①《鲁南整支工作总结报告》，时间不详，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8-01-0010-004。

②中共山东清河区委：《清河党一年半组织工作报告（1940.11—1942.5）》，山东省档案馆藏 G025-01-0001-003。

③《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④《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

⑤黎玉：《从泰山区支部的病态谈到今后的整理支部工作》，山东省档案馆藏 G001-01-0065-007。

⑥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7页。

⑦《清河区委组织部关于整支工作的讨论布置进行情况》，1943年3月12日，山东省档案馆藏 G001-01-0086-004。

与印发单行本，以便指导各地开展普遍整顿支部工作。

在普遍开展农村支部整顿工作阶段，改变第一期试点阶段实验点基本是各根据地基本区工作基础较好的自然村支部的做法，采取分类实施等方式，实现基本区、游击区、敌占区三类地区的全覆盖。鲁南区还将支部分为抗战前建立、1940年突击发展时建立、1942年6月在减租增资群众运动中建立或重新改造的支部三类，有针对性地制定整顿办法。普遍整顿支部的首要工作是普遍深入进行对整支意义和整支经验的传达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对支部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各地整顿支部的具体做法各有不同，一般经历五个步骤：第一步调查了解支部的历史，村庄的经济、政治、军事、抗日活动情况，并从此找出目前全庄的中心环节；第二步就是布置动员，保证完成支委确定的中心工作；第三步开展思想斗争和反倾向斗争；第四步动员提拔干部；第五步整支总结。^①

在普遍整支阶段，各地紧紧依靠农村支部委员和全体党员，将整顿支部与群众运动、党的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加强教育相结合，把党员教育作为基本工作贯穿整顿支部工作的始终，将党群关系如何，是否维护群众利益作为检验支部工作的根本标准。评价的重点和标准由过去向上级负责，以完成征收田赋、扩兵、征粮、收税为首要目标，转变为以满足群众利益和群众需求，取得群众满意，得到群众拥护为主要标准，使支部真正成为维护群众利益，融入群众的组织。整支工作把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整支干部负起支部教员的责任，发动党员学习，提高其政治与文化水平，克服农村党员中宗派、自私、迷信、落后的传统，改造党员。改变过去许多地方单纯整理组织的做法，将群众斗争、整理组织、党员教育作为加强党支部建设的三个不可分离的基本环节，一体推进。

1944年山东抗战形势日趋好转，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恢复到1940年大发展时的局面。据1944年2月22日山东分局向北方局报告：山东共有地方党员114637名，支部6871个，部队党员21754人，党员共计136391人，恢复甚至超过1940年最兴盛的时期。^②山东分局决定农村党支部工作由专门整顿转变为常态化建设，以适应抗战即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军事斗争出现新局面的发展形势。1944年7月，山东分局关于七八九十月群众工作补充指示提出一切通过支部，“首先，实行一切通过支部，并在实际行动中整理支部，发展党，认识真正的忠诚积极分子。过去脱离群众要求、群众工作来长期整理一个或几个少数的支部，而忽略其他，是不正确的，应转变。在新地区则在斗争中，经过慎重选择纯洁的积极分子培养党员对象，防止流氓混入，建立支部。纠正和平发展党及支部脱离群众运动的现象。”^③之后，各地把支部建设与减租减息运动、查减、大参军、大生产运动等党的各项重点任务和工作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发展支部，提升支部效能。如1944年8月胶东区党委作出查减决定之后三个月内，“共发展新党员887人，新成立党支部38个”。^④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初步形成了系统的比较完善成熟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党支部对村政权、群众团体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基本确立。

结合群众运动和减租减息开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用党的理论和阶级话语取代过去传统话语体系，削弱了乡村传统统治者地主、富农的话语权和利益，乡村控制的实际权力逐渐转入党依靠的对象贫雇农手中。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在根本上重塑，党员的构成由中农、富农占优势转变为贫雇农占优势。据1945年前期统计，党的工农基本成分占到62%。^⑤支部成员与一般党员也对党的性质和与群众关系的认识基本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的观念，掌握政策法规，支援前线的能力有所提高，基本具备了在实际工作中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统筹考虑的意识。在传统农村权力文

^①《鲁南整支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藏G028-01-0010-004。

^②《地方党员数目表》，1944年2月22日，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1941年6月山东所辖的鲁西区划归冀鲁豫边区。

^③《中共山东分局关于七八九十月群众工作补充指示》，1944年7月，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2页。

^④申春生：《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

^⑤《老解放区支部建设问题——华东局组织工作会议总结之二》，1946年4月，常连霆主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6页。

化网络中最为弱势的贫雇农，更多依赖上级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实现了党组织权力的下探，“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迥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①

1943年之后以解决党群关系为中心的山东农村党支部整顿与建设，基本实现了党组织的目标与群众利益形成契合的设想，党组织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在群众中的动员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中共来说，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其持续不断地向乡村渗透之后所产生的惊人的动员能力，从而能够透过其农村基层组织提供大规模的人力和后勤支援。”^②

支部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团结群众的核心。在山东抗战残酷的三角斗争中，一度力量强大且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东北军于学忠部和省政府在日伪军打击下，1943年7月被迫撤出山东，丧失立足之地。而起初相对弱小处于劣势的共产党不但生存下来，而且由最初的2000人发展到20余万人，实现了百倍的增长，武装力量从无一兵一卒发展到八路军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其根本就在于在抗日烽火中不断生长壮大，与千万群众血肉相连，深深扎根齐鲁大地，打不垮，摧不毁，生命力强大的基层组织农村支部。

结 语

山东农村支部在抗战时期的生长、发展和成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金冲及从抗日武装力量的产生发展、根据地创建方式、领导人变更等视角分析研究，认为与其他根据地相比，山东抗日根据地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③从党的建设视角来看，抗战伊始，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山东地方组织在全省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④根据基层组织支部和党员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在1939年其他地区党一般停止发展，以整顿和巩固为主之时，提出适合山东特点的发展与巩固并重的方针，坚持群众斗争、组织整顿和党员教育三位一体推进，以密切党群关系为中心，专门整顿与常态化建设相结合，形成行之有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党支部建设的做法和基本经验，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特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地方支部建在村庄，党组织的意志和力量能够及时顺畅地传递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他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也是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抗战时期是中共基层组织支部在山东广大农村从个别的秘密的组织发展成为数量规模巨大的公开半公开组织，深深扎根民众，融入整个社会并取得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时期。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支部党员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低下，民主精神缺乏，支部建设与经常性行政工作融合不够等问题虽未有效解决，农村支部建设取得的成效仍是巨大的，“山东党的支部在创造与建设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党在支部工作的领导上有其不可否认的成绩。”^⑤支部密切联系了群众，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对敌斗争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山东农村基层组织支部建设的探索、取得的成绩以及基本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①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②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48页。

③金冲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

④毛泽东：《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939年12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

⑤《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关于半年来整支中几个主要经验的总结》，1943年8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8页。

From Breaking Ground to Taking Root: the Growth of Grassroots CCP Organizations in Rural Shando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Ye-shang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Qilu Medical University, Zibo 255300,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s a critical stage for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maturation of grassroots CCP branches in rural Shandong. It was a key era for winning over the masses and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In 1939, when the central leadership generally decided to halt the expans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o focus on consolidation and rectification, the Shandong party organization—considering the relatively slow and lagging development of its branches and members—creatively proposed a policy of emphasiz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Through methods such as universal, balanced,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standardized development, it achieved rapid expansion in the scale of grassroots branches and party membership. Additionally, it explored a tripartite approach to branch construction, integrating mass movements, organizational rectification, and party member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Shandong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employing strategies such as whole-party 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 (assigning responsibilities downward), pilot projects, specialized rectification combined with regular branch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ing the core leadership role of branches in rural areas. These effective explorations i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enabled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o fully exercise its 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functions. The basic experiences formed during the rectification of Shandong party branches in this period,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authority of branch party members, closely linking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with mass movements and party member educatio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in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handong Provinc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party branch; party building

[责任编辑 山阳]